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s

略論「中國性」問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udy of
the Issue of "Chineseness"

涂經詒
Ching-I Tu*

* 羅格斯大學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亞洲語言及文化學系教授。

壹

對於「中國性」(Chineseness)的探討,在學界並不是一個新課題。所謂「中國性」,在不同的學者筆下也往往被稱作中國的民族性、國民性、國民心理、文化特質等等。雖然可能各有不同側重,但總的來說,這些名詞所指的都是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當中「一以貫之」的文化精神。從橫向來說,這種文化精神把中國文化同其他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區別開來,標明了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從縱向來說,它是貫穿於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領域的歷史產物,是維繫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具體而言,它又可以被細分為民族性格、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行動方式、家庭與社會結構等諸多方面。「中國性」的內涵一方面隨著時代和地域的不同而不斷發生著歷史性的變遷,而另一方面又在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穩固的、為全民族普遍接受的核心特徵,世代傳承,直到今天仍然對中國社會和文化具有深刻的影響。

對「中國性」的討論可以上溯到中國文化的初期。有些學者認為,在西周時代(1046-771BC)早期,「中國性」的觀念就已經形成。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孔子(551-479BC)學說的出現代表了「中國性」觀念的成熟。雖然具體年代尚有爭議,但大家公認,隨著中華民族的演進和古代文化的發展,中國人很早就建立起「中國性」的自覺。然而在中國古代,這種「中國性」的觀念常常表現為所謂「華夷之辨」。這種認識一方面以文化而非種族血統為標準,其開放性在今天仍值得重視。但另一方面,它又或隱或顯地強調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中國與世界其他文化之間平等的交流。古代中國文化在本地區長期處於「唯我獨尊」的優勢地位,又由於地理的原因與世界上的其他先進文明相對隔絕,這使得古代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影響到他們對於自身進行深切的反思。

「中國性」研究在近代經歷了重大轉變。這種轉變明顯受到中西文化之間衝突和交流的影響。西方把中國當作文化上的「他者」加以觀察研究有相

當長的歷史，最早大概可以上溯到十六世紀在華耶穌會教士的著作。在此後數百年間，傳教士、外交使節、商人、漢學家、以及對中國感興趣的一般外國學者，紛紛從不同角度對中國進行考察研究，在西方建立起一個「中國學」的傳統，同時也在西方人心目中營造出一種「中國性」的觀念。但在近代以前，西方世界對「中國性」的認識並未對中國文化自身產生重要的影響。從十九世紀中葉起，情況有所變化。中國與西方的直接來往日漸頻繁，在此前後，一批由西方人士撰寫的探究中國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徵的新作品接連問世。¹這些作品對中國文化往往有尖刻的批評，有時明顯帶有偏見，這與早期西方著作將中國一味理想化的態度顯著不同。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開始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影響。現代的「中國性」觀念，可能並非從傳統文化中自然產生，而是源於與西方文化的接觸。

中國學者和思想家很快也開始了相關的探討。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蔡元培、魯迅、胡適、陳獨秀、梁漱溟，以及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等重要歷史人物都對中國的民族性提出過他們的看法。他們對「中國性」的分析在許多方面受到了上述十九世紀西方著作的影響和啟發，但並不是西方觀點的簡單翻版。中國本土的思想家研究「中國性」，無論其具體立場有多大的差別，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不管是闡揚民族文化中的優點，還是批判民族性中的弊端，他們都想通過對民族傳統的分析整理，為中國建立起一種符合現代要求的國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或者民族性格（*national character*），並以此來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他們研究「中國性」，正是爲了要改造「中國性」。

1 其中較著名的如法國人古伯察（Regis-Evariste Huc）的《中華帝國—韃靼、西藏旅行記續編》（*L'empire Chinois. Faisant Suite a l'Ouvrage Intitule Souvenirs d'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hibet*）（1854年）、英人密狄士（Thomas Taylor Meadows）的《中國人及其叛亂》（*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1856年）、庫克（George Wingrove Cooke）的《中國》通訊集（*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1858年）、德人利希霍芬（F. F. Richthofen）的《中國》（*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1877年）及美國人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中國人的氣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4年）等。

這些早期思想家對「中國性」的研究具有下面幾個特點。首先，因為探討「中國性」有迫切的現實針對性，難免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所以，他們對「中國性」的解讀彼此有很大差別。其次，雖然有種種差別，但他們的討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默認前提，就是確實存在著一種涵蓋了全部中國文化的抽象的中國民族性，並且可以以此為基礎，通過肯定、否定、移植、改造等各種方法，實現他們振興民族、革新國家的理想。第三，雖然研究者立場、環境和意識形態背景等等因素實際上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對「中國性」的探索，但早期的學者們似乎對此缺乏充分的自覺。在他們看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乃是一種「主客二分」的關係，研究者可以置身於所研究的「中國性」之外，用一種類似自然科學研究的態度，為問題尋找一個完滿的、甚至是唯一的答案。²最後，在他們討論這種「中國性」的時候，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持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即是：將中外、東西加以對照，通過與外國文明（主要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比較，來歸納總結中國文化的特質。

關於「中國性」的討論一直延續到今天，仍舊是一個受到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而且觀點日趨複雜多樣。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於人們對於「中國」和「中國人」的理解變得模糊和多元。從歷史上說，中國的疆域屢經變化，有時擴張，有時收縮；「中國人」的定義在不同朝代、不同時期也各不相同。如果拋開疆域和民族的界限，把「中國」理解為一種「文明」，仍有種種問題。例如，中華文明在歷史上影響深遠，遠遠超出現代中國的疆界，及於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等。在探討中國文明的時候，我們又應當如何看待這些國家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國性」呢？此外，中華文明的各個具體組成部分在不同的朝代也互有消長，並不總是可以等量齊觀的。如有的學者指出：

2 這種科學崇拜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潘光旦對「中國性」的研究。他把遺傳學和優生學這類自然科學的理論直接引入了對「中國性」的討論，認為中國文化的種種弊端是數千年來「劣勝優汰」，人種退化的結果。參見潘光旦：《民族性格與民族衛生》（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簡言之，沒有任何一種簡明的答案能夠讓人滿足。就社會形態而言，中國總體來說一直是一個農業社會，但中國也有許多鮮明的特性是在城市當中發展起來的。就政體而言，君主制下的官僚機制在中國持續了超過2000年之久，但農業中國的許多地區曾經長期受遊牧民族的部落貴族制度統治，並且現代中國領土的一半以上在歷史上都曾發展起各種不同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如果我們轉而依賴更為寬泛的「文明」的觀念，把所有在中國產生和發展的思想、價值和制度統統包括在內的話，那麼，我們就需要探究一種非常複雜的機制，這種機制必須從整體上加以把握。³

他進而提出：「所謂“中國性”的精要，就是那種非同凡響的綿續性，它隨著世代的推移，使這個文明的特徵日益顯著。」⁴自現實而言，在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由於歷史背景的不同，逐漸形成各自的地域文化。它們一方面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一方面又有顯著的差別，難以簡單納入一個「大一統」的民族文化框架當中。在海外，遍佈世界各地的華人立足於當地的文化環境，微妙地調適他們的文化身份和心理認同，而且不同地區的海外華人對於中國文化的認同可能又抱有不同的態度。凡此種種，都在悄悄改變著「中國性」的內涵。

除此以外，近年來各種現代理論層見疊出，在觀念和方法上對新一代中國研究學者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譬如對「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抗拒，對「反記憶」（counter-memory）的重視和挖掘，對「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批評，以及視國族意識為「想象的群體」（imagined communities）等等，諸如此類的新理論引發了不少對於「中國性」概念的質疑。一些學者從研究「中國性」的多元含義出發，對這個概念加以解構。他們認為，這種涵蓋了整個中國文化的「中國性」只是一種現代的「迷思」（myth），而且對這種宏大的「中國性」的堅持，會壓抑許多來自底層的鮮

3 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

4 同前揭書，頁2。

活具體的聲音。因此，他們的研究往往從國族（national）的層面退守到地方（local）的層面或者個人的層面；「中國性」似乎成爲了一個過時的、甚至需要破除的對象。但是也有學者仍然堅持早期思想家的觀念和方法，繼續對「中國性」作正面的解讀，並探索符合現代中國需要的「中國性」模式。較著名的有Francis L. K. Hsü（許烺光）對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性格比較研究。在臺灣的學者李亦園、楊國樞和文崇一等，在這方面也作了深入研究，對傳統中國人的性格和社會行爲以及它們在現代社會的「蛻變」有詳細的說明。最近大陸學者易中天對中國人的性格也提出了一些看法。⁵這兩種不同的趨向顯然反映了學理上的差異，同時也與相關學者所處的具體環境有內在的聯繫。

由上面兩點出發，對「中國性」的新興研究還具有另外一個特點。與早期中國思想家相比，現代學者們對自己在研究「中國性」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之中有人提出，對「中國性」的研究類同於對文本的解讀，即使面對同一個文本，不同的閱讀策略（reading strategy）也可以引發不同的理解。需要補充的是，所謂「閱讀策略」並不是研究者自己隨心所欲的自由選擇，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生活和思考，也只能在歷史提供的有限空間裏發揮個人的創見。簡言之，「中國性」的研究者是一個在具體歷史語境中活動的闡釋者。在這些學者看來，解讀「中國性」過程中第一重要的工作，並非是給「中國性」尋找一個完美的答案，而是對他們自己的地位和角色有一個清晰的、歷史化的認知。探索「中國性」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他們「反躬自省」的過程。雖然不見得每一個當代學者都具有這樣的意識，但總體上說，這的確是當前「中國性」研究中的一股重要潮流。

5 參閱李亦園、喬健（合編）：《中國的民族、社會與文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年）；楊國樞：《中國人的蛻變》（臺北：桂冠圖書，1988年）；易中天：《閒話中國人》（北京：華齡出版社，1996年）。

貳

當代學者對「中國性」多元面貌的認識在他們的研究中有明顯的反映。下面我們以一些個案為例，對此作進一步的探討。

發生在兩岸三地之間的對「中國性」理解的分歧，是當前「中國性」研究中的重要部份。譬如中國大陸的「新保守主義」、臺灣的「本土性」和香港的「邊緣性」論爭，近年來成爲關於文化身份認同的熱門話題。這些問題最終都可聯繫到對「中國」的闡釋。⁶一般來說，在當前全球資訊年代，「國家」的觀念本身已經變得很有問題。它不再是針對某一疆域和民族的固定觀念，而是日趨模糊多元。「國家」概念的模糊性使現代人無法簡單地建立起固定的國族身份，這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各種焦慮，並隨之引起各種激烈的論爭。但是我們又不能通過簡單地依賴對「中國性」的傳統理解來消除焦慮，化解問題。舊有的中心／邊緣，或者全球／本土的二分對立模式在新的全球化經濟格局下已經顯得過時。在現代的語境中，與其把「中國性」理解爲一種確定的特質，倒不如將它看作一個各種理論話語交鋒的戰場，一個各種權力關係交錯的領域。想依靠它爲我們提供有效的身份認同只會徒勞無功。然而現代兩岸三地學者當中依然有人執著於這種嘗試。原因之一，是他們企圖通過建立這種貌似純粹的國族身份，抗拒隱藏在全球化潮流當中的西方世界的強勢霸權。但過分堅持這種身份認同，實際上反而會削弱批判的力量。⁷

除了討論中國本土兩岸三地語境中「中國性」的複雜含義，從海外華人的角度來探索「中國性」的現實意義也是當前一個重要課題。「海外華人」這個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種模糊性：是僑居外國的中國公民還是加入了外國國籍的華裔人士？是成年后移民海外、童年時移民海外，還是生於外國？是在海外的什麼地方定居，美國、歐洲、東南亞，還是別的什麼地方？由於具體情況不同，「海外華人」對「中國性」的認知也就呈現複雜的面貌。

6 朱耀偉：〈闡釋「中國性」：九十年代兩岸三地的后殖民研究〉，九十年代兩岸三地文學現象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2月8日），參見http://www.ln.edu.hk/clt/docs/con0006/paper/060014_ywzhu.PDF，頁1。

7同前，頁30-31。

有的作者以研究者和美籍華人的雙重身份，探討了回中國「尋根」對美籍華人的意義。對於現代的美籍華人來說，他們對中國的感覺是模糊的。一方面，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樂意，他們總是和中國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實際又是陌生的。在土生土長的中國人看來，他們不夠「中國」，而在一些美國人看來，他們又不夠「美國」。當今全球化的潮流使問題更加複雜。依照一些學者的說法，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媒體、資訊、資本和人口在全球的流動日趨多樣，而這種流動正改變著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和文化身份的「中國性」。以前，生長在大陸的中國人和生長在美國的美籍華人之間其實並沒有多少直接、密切的聯繫。連接他們的，並不是實實在在的社會關係網絡，也不是共同的具體文化、政治理念，而是一種「同源同種」的迷思（myth），這種迷思的基礎，就是混雜了種族、國別和領土意義的「中國」身份。目前全球化的趨勢使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有了更多實際接觸的機會。但這種全球化的潮流並不一定帶來一種大家共同接受的「中國」身份，卻往往進一步凸現了各地華人身份認同上的差別。生活在世界不同地區的華人對「中國性」本來有各自的理解，通過跨國交流，他們對「中國性」概念的多元性、複雜性有了切身體會。但有關的政府（或者說國家）在現實的運作中，卻總是努力營造一種純粹的、涵蓋所有華人的國別身份。這兩種趨勢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學者進而根據自己的研究指出，「中國性」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地方層面、國族層面、跨國層面各有不同的含義。⁸單純的國族認同不能取代諸多海外華人社群對「中國性」的獨特理解，而在跨國的層面上，「中國性」更是日益明顯地成為一個開放的對話空間，一個不同觀點交流的平臺。

「海外華人」另一集中的地區是東南亞。東南亞的歷史與現狀與美國很不相同，這裡的華人對「中國性」的理解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馬來西亞是一個有趣的例子。馬來西亞的華語文學頗為發達，但圍繞著馬華文學與本土文

8 參見Andrea Louie, *Chineseness Across Borders: Renegotiating Chinese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 Yen-Ho Wu,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nd Non-Chinese Identities," in Susan Blum and Lionel M. Jessen eds. *China off Center: Mapping the Middle Kingdo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167-82.

學及中國文學的關係，當地華人作家和學者們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這歸根結底還是對「中國性」的理解和認同問題。有的作者激烈地拒斥「中國性」，甚至提出「去中國性」的口號，把大陸「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史認作一種殖民話語。這種作法顯然意在通過強調其本土性把馬華文學從中國文學中分割出來，進而將其融入馬來西亞民族文化傳統。但如有的批評者指出，這顯然是一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因為「選擇以華文書寫，其實就意味著與“中國性”的永恒纏繞。」⁹所以，與其談論「去中國性」，不如探索「立中國性」，即「創立有機融合於“馬華性”中的獨特中國性。」「中國性」雖然是一個相對的、開放的觀念，但「中國性」並不是一種虛幻的「迷思」。它具有巨大包容性，不斷發展演進，是一種具有極大價值的文化資源，不應被輕易捨棄。因此，與其消極地抗拒「中國性」，不如從海外華人的獨特視角出發，建構屬於自己的那種具體的「中國性」，並積極地參與關於「中國性」的多元的對話。這種建設性的態度提示出「中國性」在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中國性」與「去中國性」之間的複雜矛盾並不是可以一夕之間輕易解除的，畢竟在它們背後還有政治、經濟、文化的種種因素在發生作用。

以上我們簡略說明了一些旨在探討「中國性」概念的多元性、相對性的研究。但從整體上把握、評價「中國性」的工作，一直也未中斷。不同與「五四」時代激進的反傳統主義，當代致力於整體性論述「中國性」的學者，多數對傳統文化抱積極的態度，認為傳統文化在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仍然可以發揮有益的影響。這種思潮的代表人物，原先主要是臺灣和海外的新儒家學者，而近年來有許多中國大陸學者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與前者遙相呼應。大陸學界原本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與新儒家學者意識形態背景明顯不同。但近年來在大陸正統馬克思主義漸漸失色，在思想領域留下大片空白，民族主義升揚，幾乎成了新的維繫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大陸所謂的「國學」熱潮便在這種背景下隨之產生。有時候，大陸學者對待傳統文

9 朱崇科：〈「去中國性」：警醒、迷思及其他——以王潤華和黃錦樹的相關論述為中心〉，《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總第17期（2003年8月）。

化的態度甚至比先前的新儒家學者還要熱切。這與他們所處的現實環境顯然有關。中國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加強了「民族自豪感」，引發了民族主義的熱潮。但與此同時，現代中國大陸社會的急劇轉型也帶來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和道德問題，令人感到困惑，急於尋找答案。這種現實成爲當前大陸學者研究「中國性」問題時無法擺脫的背景。

新儒家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極論述已經爲學界所熟知。例如，有的學者認爲，中國哲學思想具有四大特性，即是：內在的人文主義、具體的理性主義、生機的自然主義和自我修養的實效主義；¹⁰也有學者在討論孔子學說的時候，大力讚美孔子的道德理性、文化關切和入世精神。¹¹在他們看來，這些特性是中國文化得以綿延不絕的根源，是建設現代中國文明的基礎。而在現代大陸學者的著作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或許受其啓發而生的相近論述。例如，有位學者在討論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時指出：

中國人在性格結構上的特點是什麼呢？概括地說，就是雙重人格特質的圓滿結合……中國人的雙重性格結構及其趨中性（即勻稱性特點），同中國文化的雙重結構及其趨中性（或勻稱性）分不開，主要表現在儒家人文主義和道家自然主義的圓滿結合。儒家的人文主義和道家的自然主義互補；作爲對儒家禮教嚴格控制和壓抑的倒行逆施，老莊的「無爲而治」實質上是爲充分發揮人文精神而另闢「治」路，最後在「淨化」高度上達到與儒家人文主義統一。儒道之間的圓滿結合點的中庸，中國文化幾千年綿延而不絕，其機理藏於中庸，在儒道之間。對「中庸之道」的絕妙發揮則是古老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合而爲一的理念境界，文化理想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型性格，和「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慾不逾矩」的成熟人格，是至剛至柔的寬大溫厚性情，「圓而神」的智慧等等。而對之惡

10 成中英：〈中國哲學的特性〉，見周陽山（主編）：《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當代研究與趨向》（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1982年）。

11 杜維明：〈孔子仁學中的道學政〉，見周陽山（主編）：《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當代研究與趨向》（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1982年）。

性發揮，又可對包括糟粕在內的不合時宜的存在之絕妙維繫和保護，使其圓而滿之，完而善之，凝而固之。¹²

諸如此類的論述在目前大陸學界並不少見。這代表了當代大陸學界對「中國性」和傳統中國文化研究一個重要的轉變。這種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與「五四」時代對傳統激烈的批判有顯著的差別，從表面上看來，反而更接近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知識界中風行的中國文化本位觀點。但現代學者對傳統文化的提倡，畢竟不是對過去思想的簡單重複。早期學者在提倡「中國性」時，往往將「中國性」看作某種一成不變的特性，忽略了在現代化過程中對「中國性」加以重新闡釋的必要。現代學者則在研究中有意識地對「中國性」加以創造性的闡發，使其與現代化的要求相適應。此外應當指出，對於傳統文化，在當前大陸學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聲音。許多學者依舊堅持「五四」的精神，對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提出質疑。這兩種不同的觀點彼此對話、爭鳴，使現代大陸學界對「中國性」的探索頗具活力。

參

假如我們同意，中華文明能夠賡續數千年而不絕，這並不是出於「天命」、運氣或者偶然，我們也就應該同意，在中華文明內部確實存在著某種特性，維繫和推動著這個文明，令它得以在外來文明的一次次衝擊下繼續生存，並且不斷自我更新和進步。當代對「中國性」的多元解讀大大豐富了我

12 沙蓮香：〈前言〉，《中國民族性2：中國人性格的文化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99年），頁XIII。作者自己註明：「本課題於1986年10月經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評審通過，被納入國家第七個五年計劃期間重點研究項目，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在〈前言〉的結尾，作者還提出：「本書的最終目的，不在論證本身，而在透過民族性格與民族精神的連帶關係，證明中國人充分發揮光大民族精神，壯志滿懷，振興中華，建設現代化國家之可能。」（XIII）。這揭示出研究的意識形態背景。這樣典型的官方研究著作，其〈前言〉裏卻完全沒有出現「馬克思主義」等等字樣。值得附帶指出的是，這部著作採取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並對調查數據進行了量化分析。據作者介紹，在對於「中國性」的研究中，這還是一個創舉。

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但如果說要從根本上消解「中國性」，則似乎過於極端。在對「中國性」的不同理解之間，總可以找到互通的可能。也許，延續性與包容性這兩個特點，可以成爲「中國性」公認的基本特徵，並作爲各種觀點交流對話的基礎。前者突出了中國文化內在的穩定性和持久的生命力，而後者則突出了中國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時的兼容並包。許多外來文化可以同固有文化彼此交融，進而成爲「中國性」的內在組成部分。

主張「中國性」在現代社會不是有待消解的迷思，而是一個富於建設性的理念，一種有價值的文化資源，這並不是簡單重複早期學者基元主義式（*essentialist*）的思維方式。「中國性」不同理解之間的彙通，並不意味著最終會重新構建起一種大一統的中國文化。在這個國際化的時代，中國文化已經隨著華人的流動而廣泛散佈在世界的各個角落，這同時也使得中國文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變體，已經無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加以描述。過去，對「中國性」的討論一般以中國本土爲中心，通過國內／國外的區別，暗中將不同類型的中國文化分爲中心／邊緣，純粹／雜駁，真實／膚淺等含有等級意義的類別。但在當代我們已經很難爲中國文化確立唯一的中心，並把某一種特定的文化形式定爲中國文化的「典型」。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談到文化身份的認同，離散（*diasporic*）和多元正在迅速成爲當前的主流。¹³「中國性」已經超出現代中國的邊界，成爲一種世界性的現象。它已經成爲一個供多種聲音對話的開放空間，但對話的結果並不是消解「中國性」，而是使它更加豐富，更具活力，更順暢地適應當前全球化的變局，並在新的全球文化中產生自己的影響。[§]

13 參見Rey Chow,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al Problem," in Peter Osborne and Stella Sandford eds., *Philosophies of Race and Ethnicity*, New York: Continuum (2002), pp. 132-133。

§ 本文稿研究資料承寧欣君協助整理，謹誌謝意。